

收藏本

# 深翻

【美国】韩丁著  
《深翻》译校组译



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 (香港)  
The Tri-City Press (USA)

责任编辑：楊 平

封面设计：石 竹

ISBN 978-988-17300-7-7



9 789881 730077

定价：76.00 元

ISBN: 978-0-9792764-2-2



9 780979 276422

\$ 30.00 U.S.

# 深翻

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

韩丁 著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Shenfan

Copyright©1983 by William Hinton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henfan

Published in United States 2008 by

Tri-City Press, LLC.

38-24 217th Street, Bayside, N.Y. 16361 USA

ISBN 978-0-9792764-2-2 90000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are available from the publisher.

Published in Hong Kong 2008 by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HK)

FLAT/RM 611 RICKY CENTRE 36 CHONG

YIP EAST KWUN TONG KL

### 香港公共圖書CIP數據預行編目資料

深翻 / (美) 威廉·韓丁 著 《深翻》翻譯校訂組 譯

第一版：香港，國際文化圖書，2008.5.

ISBN 978-988-17300-7-7 (DO30852)

開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張：49

版次：2008年5月出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書名：深 翻

社長：汪森雷

總編輯：劉乙潔

裝禎：石 竹

出版：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香港）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HK)

印制：國家文化傳播集團發行有限公司

代理：國家文化傳播集團發行有限公司

地址：FLAT/RM 611 RICKY CENTRE 36 CHONG

YIP EAST KWUN TONG KL

電話：(852) 23892981

傳真：(852) 35702333

網址：www.cicphk.com

電郵：gjwhcb@yahoo.com.hk

定價：RMB 76.00 元整

HK\$ 85.00 元整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出版说明（英文版）

1971年，威廉·韩丁又来到了张庄，这个他在革命后的土改时曾住过数月的中国农村，也是他在《翻身》中所记录和反映的地方。他回来的目的是想通过和20多年前曾与他一起生活工作过的张庄农民们交谈，来了解他昔日的梦想是否已变成了现实。在此之后，他写出了《深翻》。靠对中国一些地区的第一手调查资料（这些地区有些对西方人是非正式开放想的），通过与相识已久的人们的推心置腹的交谈，韩丁先生的《深翻》既给我们展示了中国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又告诉了我们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深翻》的价值更在于，它没有从国家和地方领导阶层或从人们自己以后的报道中寻得现成的材料，而主要靠韩丁对当时中国细心的、卓越的观察和认识。

最引人注目的是“大跃进”全面推动的新面貌，通过如何激发农民起来互助的使人信服的描述，通过农村地区的整顿，全面了解中国，洞察毛泽东的策略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深翻》的价值更在于，它把我们带进了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的回忆中，苏联撤走专家后一对青年伴侣的失望中，一位语言被用来为“革命”服务的人的迷惑中。

在书中，他还为我们展示了美丽的景色，尽管我们不是旅游者，但我们却与他一起步行30里到了暴风雨肆虐后的张庄，我们坐在黎明前的薄雾中喝茶、聊天，互相拥抱。我们与当年相识时还是孩童的青年男女一起，在自由市场吃甩饼、吃拉面，我们赶猪、抚摸丰收的粮食。

《深翻》意为深深地刨，把地再翻一遍，到地球的深处去翻出更肥沃、更能丰产的土来。这便是韩丁这本书最准确的主题。

## 作者简介

韩丁（1919—2004）是个与中国劳动人民有着深厚感情的美国马列主义者。

他出生于一个芝加哥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是个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家，一手抚养了韩丁（即我舅舅）和两个女儿（即我姨母和我母亲寒春）成人。

17岁的韩丁只身周游世界，一路靠给货船洗碗打杂为生，后来又在日本当了半年的英文记者，1937年路经日本占领的东北，由铁路通过苏联、波兰、德国后回美国。

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吸引下，从哈佛转到康奈尔大学毕业的韩丁，受斯诺“西行漫记”和他激进姐姐的影响，从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改变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多次来到解放前的中国，1945年在重庆会见了正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1948—1953年又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花了九个月的时间，观察、参与了山西长治张庄的土改运动，做了大量的笔记。

在美国麦卡锡反共高潮的50年代，他勇敢地与美国国会反共调查委员会周旋，迫使美国政府退还他回国后被海关没收了的纪录张庄土改过程的原始笔记。

同时，他在美国费城一边修理各种运输机械和码头吊车，一边参与工人运动。在被老板列入黑名单，剥夺了工作权利后，他于60年代开始一边经营自己的农场，一边利用农闲撰写了叙述张庄土改运动的《翻身》一书，于1966年出版。

1971年他再次回到中国，曾多次与他的妹妹寒春和妹夫阳早，一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有时长谈达6小时之久。

是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创新精神鼓励着他，吸引着他多次重返

张庄，前后近 30 来次。成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使者。通过采访，他记录了张庄的合作化和文革的全部过程，写下了《深翻》这本书。

此外，他还帮助张庄人民大搞农业机械化，成为张庄人民爱戴的荣誉社员，长治市第一位荣誉市民。

在中国劳动人民成为弱势群体的近 30 年中，韩丁不断的为他们的命运呐喊，写下了《大逆转》和最近刚出版的《透过墨镜看中国》(Through A Glass Darkly) 等书。韩丁虽然与世长辞了，但是他对中国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通过这些书保留了下来。他为后人研究中国劳动人民的近代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阳和平

(现为外经贸大学教授)

## 致 谢

首先，我要感谢张庄老乡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热情接待。感谢他们那样耐心地给我讲解、说明、回忆张庄曲折的历史，并感谢他们教我学会了使用中国的锄头。

同时，我要衷心感谢马厂公社、长治市、晋东南地区和山西省委的领导们，没有他们的协助，我根本不可能在张庄进行调查，了解周围及其老百姓生活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

在中央，周恩来总理在别的国家领导人认为《翻身》是一部很有争议的著作的时候，以非凡的勇气和胆识邀请我到中国来。他把我、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看成世界大家庭的成员，不愧是一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我还要感谢大无畏的邢降为我们安排长途旅行。周总理逝世后，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及其主席王炳南，欢迎我继续多次地回到晋东南进行我的旅行和调查。张学亮和郭子佩为我们作了出色的向导和翻译，尤其使我们感到舒心的是他们对农民及农民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关心和尊重。坐落在北京饭店对面拐角处的对外友好协会总部是一个疲倦了的旅行者感到放松的好地方。

在美国，我要感谢兰登出版社对我多年的耐心支持，即使在这本书好像写不出来的时候，他们也耐心地给我以支持。托妮·莫里森，一位最富有同情心和奉献精神的编辑，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才使我能埋头完成这件似乎没完没了的工作。没有她对文章各章节的顺序和合理性安排的帮助和指点，我也许早就放弃这件工作了。

我还要感谢兰登出版社的艾琳·阿和思和宾夕法尼亚州道坡顿出版社的道缙·西黛尔。她们把我难以辨认的、重复修改的草稿变成了清晰的著作。

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我女儿卡玛的谢意，她陪我两次在张庄长期逗留，一直在为我做翻译。而且还自己深入了解、熟悉了张庄生活



的一些侧面，一些我通常没法进入的侧面。她对中国生活深入的、直观的理解加上她对中国文学及文化的掌握，为我打开了许多方便之门，帮我避免了许多方面的差错。卡玛和高富贵拍摄了数千张张庄人物及景物的照片。从他们丰硕的成果中我选择了一部分最有助于说明本书内容的照片。

我还要衷心感谢现在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念书、原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吴宏，是他向我建议把“深翻”作为本书的书名，并道出该词的层层含义。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全家十几年来对我由于写作的艰辛而常常情绪反常而表现出来的耐心，和由于写作时间过长而不可避免地引起的资金紧张和生活艰苦而表现出来的宽容。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来写这本书，我放下了农场的活计，推辞了各种讲座。虽然我们从未担心过下一顿会饿肚子，但却常常担心能否交得起取暖的油费，能否按时交税，担心债台高筑。不过，我希望韩娜、韩迈克、韩莉和雷州安会觉得这些是值得的。

韩丁

## 致 谢

韩丁通过叙述山西长治张庄土改后20多年的发展，来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变迁的著作《深翻》，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为此我十分高兴。

这是继《翻身》之后，韩丁再次长期在张庄蹲点，通过参加当时农村的整风、学大寨，和走访众多群众、干部所收集到的大量一手资料和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又经过多年辛勤的写作，多次重访张庄核实记录资料，完成了这部反映山西农村从合作化到文革中期社会变革的纪实文学著作。

这本书的中译版出版来之不易。自从英文原著1983年在美国出版后，韩丁在张庄大队结识的终身好友王金红书记，就开始组织长治当地人士李春、李书祥共同翻译该书。90年代初，韩丁和长治的同志们就认真地校对了翻译初稿，而且韩丁还专为此书的中文版写了前言，纠正了他原著中的一些错误观点。但是他们希望该书早日在中国出版的愿望未能实现。

去年，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海内外一批研究社会学、历史和农村问题的学者，重新校阅、校订，甚至逐段地重新翻译了全书，并付之出版。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由集体奋力20多年的精神产品。

为此，我代表我哥哥韩丁诚挚地感谢这些长期以来致力于翻译和研读《深翻》的中国朋友们。是你们反复钻研、坚持不懈，终于实现了韩丁的遗愿，使得该书得以在中国读者中发行。

同时，我要借《深翻》的中文版出版之机，代表我哥哥诚挚地感谢上党地区的人民群众，感谢长治市政府和郊区政府，感谢长治的父老乡亲给予韩丁深入中国人民、考察长治农村社会变革的机会和创作的土壤。

我还要在此特别的感谢山西长治市委宣传部及范丽霞部长，感谢

长治市郊区党委及孙宏波书记，感谢长治市郊区人大常委及陈世和主任。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本书是难以和中国读者见面的。

英文著

Joan Hinton 霍春

2008年5月7日于北京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许多人士的帮助，在此致谢。  
首先，感谢我的丈夫，霍春，他不仅是我生活中的伴侣，更是我工作中的良师益友。没有他的鼓励和支持，我无法完成这本书。  
其次，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们，他们在我遇到困难时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温暖。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是我坚强的后盾，他们的爱和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

丁 著

## 献给王金红 张文英

在这两位张庄农民的身上体现着那么多中国人长期发扬下来的优秀品质——艰苦、朴素、坚韧、顽强、勤劳、善良、热情、勇敢，富于好奇、善于思考、富于幻想、勇于创造。

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两种新的，在世界其它地方少见的，对农民兄弟的信心和合作精神。只要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相信，鼓励王金红那样的男人和像张文英那样的女人，中国就一定能繁荣昌盛。

我想起马克·吐温说过的一句话：

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农民也是人。在许多方面像我们一样的人。我还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发现自己也是人，然后，我想，他们会站起来要求被当人看。到那个时候，麻烦可就来了。

韩 丁

## 自序

没有什么事情比领导开创一个新的事物的秩序更难以着手，进行起来更具有风险，和更没有成功的把握的了。

尼·马基雅维利

为了写张庄当代的历史，我收集了各种有关的原始材料。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历时很长，还必须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为了取得某些材料，得进行一二场战斗；为了保有这些材料，又得进行一二场战斗。我慢慢地消化这些材料，更加慢慢地把这些材料捏成现在这样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张庄的历史，以其不断展现的复杂性，要求作者作出回应。一条笔记一条笔记，一个回合一个回合，一页一页，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写作计划，让我欲罢不能，终至成为毕生的工作，这确实是当初所没有料想到的。

从我在张庄所作的最初的那几页笔记开始到《翻身》一书问世为止，一共经历了18年时间。从《翻身》出版到《深翻》即将问世，又经过了17年时间。最后一卷《立春》可能又要花两年的时间。我的写作计划一拖再拖，原因可以说一言难尽，在此我只想说明，几次最长久的拖延，都是出于我个人不能控制的原因。我1948年离开张庄，其后五年时间都用于教中国农民，帮助他们学习农业机械技术，因此没有时间写作。我于1953年回美国，美国海关把我所做的笔记没收了，交给了伊斯特兰参议员主持的国内安全委员会。我打了一场漫长而昂贵的官司，才最终在1958年赢回了这些被没收的笔记。手上有了笔记，我花了6年时间写书，又花了两年时间找到一个敢于出这本书的出版社：斯威奇和何波曼主持的每月评论出版社。他们在1966年出版了《翻身》。

在我写完《翻身》之前好几年，我就打定主意要回张庄去看一看，了解土改之后对那里的村民而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惜当时我做

不到。美国政府禁止我旅行。因为我在1949年之后留在了中国，回美国以后又发表了赞扬中国革命的言论，国务院的西普丽女士拒绝发护照给我。长达15年之久，除了美国公民不需要护照的墨西哥和加拿大两国之外，我不能离开美国国门半步。

美国最高法院于1958年做出了标志性的决定，国务卿不能因公民的政治信仰或结社而拒发护照；1964年就阿普特克一案所做的裁决确认了，即便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这样的美国公民，也享有出国旅行的自由。然而这两个判例，却不能帮我解决问题。国务院的护照司绕过法律，利用行政规定作藉口进行刁难，拒发护照，因为他们知道我想去中国，而中国仍在受限制的国家名单之上。

1967年，我终于忍无可忍，扬言要控告国务卿狄恩·腊斯克。护照司才有所软化，发了护照给我、我的妻子和我两岁的女儿。但是他们在护照上盖了一个章，印上了“中国旅行无效”的字样。如果我们不管它，照样去中国，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用了一个方便的作法，即入境时在另外一张纸上、而不再护照上盖印。技术上而言，美国人出入境时不需要用护照。放心了，我们于1968年初乘飞机去伦敦，通过那里的中国大使馆，要求允许我们去北京和上海。

我们一连好几个星期等待中国的答复。终于表示遗憾的答复来了：“此时不方便接待你们。”我们的感觉是已经走了这么远，现在要回美国才真是不方便呢，但我们别无选择。一直到几年后我们才知道，长治市发生了武斗，就连解放军的士兵要去张庄，也得冒生命的危险。

1970年武斗平息了，全国各地包括偏远地区，都重新建立了稳定的地方政府，中国也恢复了接待外宾的能力。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决定打破中国在上处于孤立的危险情况，开始恢复与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接触。他们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与三位美国作家联系，这三位作家是斯诺，杰克·巴尔登和我，都写过比较深刻描述中国革命的著作。他们在1970年请了斯诺，毛泽东的老朋友和他的生平事迹的撰述者。中国政府表示欢迎我和家人去中国访问，而且想留多久就多久、想去哪就去哪。当我接到这个讯息时，斯诺人已在北京，再次对毛泽东进行访问。1971年4月，正在我们着手打理在美国的事务、安排去中国的旅行时，乒乓外交震动了世界。我们4月23日抵达北

京，在中国停留了7个月。我们本来会停留得更久，因为我们担心我们的小孩回到宾州库兹唐镇小学成绩跟不上而回国。在这7个月当中，我的女儿卡玛一直陪着我们，她在北京出生，在中国生长、受教育，英文也很过得去，在她帮助之下，我们得以一层一层的深入中国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如果这本书道出了真实的一些复杂纤细的纹理，主要应归因于她的参与。

在这7个月内，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周恩来总理到处为我们开方便之门：在北京二七车辆厂，我们留了5个星期，我还在车间工作了一段时间；在清华大学，我们停留了18天时间，访问对立的两派学生；在山西中部的大寨，我们赶上了7月份最热的日子，在那里下田劳动、爬山，和大寨大队书记陈永贵多次会谈；最后在张庄村，我们伴随着负责整风的工作组，一直到秋收结束、为准备明年种植庄稼进行深翻为止。

我们此行看到的、听到的，实在不可能全部吸收。光是思考文化大革命问题，就足以占用睡眠以外的全部时间了。我们想要了解那一段非比寻常的动荡岁月，而同时我们还要对1949年以来这一整段历史进行补课。离开时，我带回来十个厚厚的大本子，每一页都是写得满满的笔记，我还带回来一个脑袋，塞得满满的，都是所见所闻的种种印象，其中有很多是互相矛盾的。回家之后我写了《百日武斗》，描述了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的历程。

我还把五次访问周恩来的记录汇编成一个小集子，名为《与美国人的谈话》，但关于张庄的材料，却比较难以转化为成品。我们听当地官员的介绍讲的一套一套的，但与我们看到的实况，和在别处听到的说法却似乎有差距。文革的争论几乎总是导致对语句的意思的完整性的严重削弱，导致广泛的概念上的弄虚作假。人们胡乱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语，往往仅仅是为了拿它们作为公然背叛原则的遮羞布。“无产阶级”一词的意思就是我和我的朋友，“资产阶级”的意思就是你和你的朋友，而你们，不用说，已经堕落成为“帮”了。“搞革命”的意思就是由我夺权；如果你夺了权，那就是“反革命”。不管是谁当权，似乎总是能用最革命的词句，把自己打算做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过一阵，人头全变了，但庄严承诺、信誓旦旦的口吻，却一成不变，包装其说法的理论外壳似乎总是滴水不漏。这些当事人

读过马克思和毛泽东著作，他们知道选哪些词句来支持他们的论点。我发现很难形成一个清晰的框架，来评价所发生的事情，更不用说找到一个适当的讲述这个故事的形式。我着手写了几章，讲的是紧接着土改后的一段时期，后来就给自己的词句绊住，再也写不下去了。

1975年我有幸再访中国，这次是以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理事的名义去的，行程为期一个月。虽然这次没有机会去张庄，但我在北京碰到了两位张庄大队的干部，谈了好几个小时。1977年我又去了张庄，在那里住了两个半月；1978年在张庄两星期；1980年又是两星期；1982年10天。这几次访问，带给我新的视角和领悟，再回来看1971年的材料，就开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了。此时中国的党和人民已经开始重新评价所谓“失去的十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讨论帮助我界定了一系列的历史阶段，其中最复杂的文革阶段，就似乎不是那么神秘费解了，即便对于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和错综复杂的矛盾还不一定能一下子就搞清楚真相。到了1978年，有利于冷静分析的气氛取代了早几年的狂热，有的人开始有勇气实事求是，闹剧就说是闹剧，栽赃就说是栽赃，谋杀就说是谋杀。虽然政治的钟摆不久又摆过了头，流行的种种极右观点，也没有多少客观性可言。但摆动本身就有利于通过反思形成新的视角，帮助人们看问题更加全面一些。

1973年之后张庄人民富起来了，这样的变化对于认识问题也是有帮助的。生产搞得不错，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人们更愿意畅谈过去的事情，作总结时也比较少带偏见。不需要因为事情搞糟了找一个替罪羊作为批判的对象，人们学会了放松，甚至在讲述过去所发生的不幸的事情，本人自己也会笑起来。也有些人由于担心再度引爆派系矛盾，不肯提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的事情还有什么好谈呢？语言只能撕裂开旧时的创伤。

《深翻》继续讲述《翻身》所开始的山西省的张庄村的故事。《翻身》讲的是这个村子从日本占领到解放进行土改，推翻几千年来地主的剥削统治。《深翻》讲的是中国农村分田以后，农民进行合作社运动的故事。

土改是急剧重新分配财产的一次风暴，它为村民自治铺平了道路，而合作化运动则与此大不相同，它是被当作“百年大事”来进行的，它的向前发展是非连续性的，有时向左，有时向右，有时在混乱中倒退，甚至陷于停顿，接着又恢复前进，势不可挡，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就。例如有的生产队，甚至在一个县的范围，1952年以来产量增加了十倍，全国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优劣截然不同，发展不平衡，时而跃进，时而陷于停滞甚至说垮就垮，合作化运动一开始，就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最近几年，大约三分之一的单位成绩不错，但另外约有三分之一的单位，或者领导犹如封建土皇帝，或者大搞平均主义，或者就是不懂管理、瞎指挥，以致长期落后，其中不乏每年靠吃国家的贷款、补贴过日子的。尽管困难重重，多年以来，国家领导人，至少是在表面上，还是能维持坚定决心，致力于克服主客观所存在的一切阻碍农业发展的的问题，培养出一个极其庞大的农村干部、积极分子的队伍；其中很多人为了确保集体所有制的运转，终年孜孜不息地献身工作。本书中描述了一个个男男女女的故事，其中大多数都是这个庞大队伍中的积极分子。

《深翻》描述了张庄的劳动者，如何从开始不协调的互助，逐渐学会在一起干活；把土地、牲口、农具集中起来，创建一个有生命力的合作社；他们的合作社又如何和别的合作社合并，形成被称为公社的联合体。它描述了张庄村民在全村都实行集体劳动之后，如何尝试了一个跃进。他们开始用本地的矿石炼铁；用自己的双手修筑水坝、水库和铁路；深翻土地，期待打破纪录的高产。结果却是大旱烤焦了田地，庄稼歉收，副业破产，生产单位太大、太集中，难于管理，以至于搞不下去了。

接下去，《深翻》描述了60年代初，自集体向个体的倒退，其后重新大干合作社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张庄的农民动员起来炮打司令部，造反夺权，全力投身于改变这个世界；运动造成了村民分裂，形成了铁杆的两派，为了争夺权力互不相让，其中最勇敢好斗的积极分子走向了全面的内战。它还描述了解放军的士兵们如何地强行维持一个扭曲的和平；而党员们又是如何地尝试团结群众和干部，恢复基层正常的生活；和重新推动抓生产的运动，然而他们的努力仅仅取得了很有限的成果。最后，《深翻》描述了1971年秋天当地和全国范围的深刻的危机。文革半途而废，毛泽东年纪大了，而且身体越来越坏；林彪死了，周恩来遭到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的攻击。张庄的派别斗争趋于平息，但分歧还将继续存在。“阶级斗争”的警钟还在鼓动新的对抗，老百姓却热烈不起来，步履维艰地迈入新的十年。